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倾向

张 邴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能顺利地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需要作好组织、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方案措施等方面的准备,同时需要广大群众的良好社会心理准备。那么,了解和把握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社会心理状况就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态度,不同于个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所呈现的心理反应,而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社会性变革、变化所具有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感,以及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心理倾向,因此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有着直接影响。鉴于此,我们于1987年1月至3月进行的“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调查”^①中,特调查测量了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原因、结果诸方面的现实社会态度倾向。

一、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的态度倾向

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各方面的态度结构中,首要的是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的态度,而这又取决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评价。这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正在于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程度。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使“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②因此,只要了解人们对我国现实政治民主化程度的评价,就可看出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的态度倾向如何。

表1是人们以世界多数国家(除少数落后国家)为参照系,对我国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代表性指标现状的评价。将表中“高”和“较高”相加,“较低”和“低”相加,结果是,第1项比例是1:12.7;第2项比例是1:6.7,显示了通过比较,多数人认为我国的“人平收

表 1

N = 1301, %

	高	较 高	相 等	较 低	低
1. 我国人民的人平收入比世界多数国家	1.31	5.38	8.38	54.19	30.74
2. 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比世界多数国家	1.77	9.68	12.37	53.51	22.67
3.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比世界多数国家	14.83	29.98	13.91	28.44	12.84

① 我们于1987年1至3月进行的“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调查”,是中共湖北省委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和资助的科研项目。此次调查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随机聚类分层抽样和问卷调查方法,发出问卷4000份,回收1989份,选取其中1301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上机数据统计。本文是根据其有关数据写的研究文章之一。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87年7月1日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入”和“文化教育”水平现状都低于世界多数国家。根据心理学原理，人们的评价越低则心理承受负荷越大，要求改变的态度倾向越积极。因此人们这种评价投射出人们对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很高。而第3项“高”和“较高”之和是44.81%，再加上认为“相等”的，共58.92%，这显示了人们对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政治体制现状具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倾向。但是，认为“较低”和“低”的占41.28%，“高”、“低”的比例是1.1:1，比例差不大。这显示人们在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高的同时，又有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还不十分高的一面。这种评价，既反映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还存在一定弊端，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不很高的实际，也投射出人们具有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以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积极态度倾向。

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对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评价存在差别，其具有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也就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对此我们对样本按职业、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三类社会群体分别进行了统计，结果评价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比世界多数国家“较低”和“低”的比率由大到小的顺序分别如下：

按职业是：知识分子群体（51.28%）、军人群体（46.49%）、干部群体（36.03%）、生产劳动者群体（30.85%），两极比差值是20.43%。对照表1的比率值41.28%，其中“知识分子群体”比率值超过了10%，“军人群体”比率值超过了5.21%；相反“干部群体”比率值低5.25%，“生产劳动者群体”比率值低10.43%。

按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群体（43.16%），其他人员群体（40.83%），中共党员群体（39.30），两极比差值是3.86%。比起表1的比率值41.28%，“共青团员群体”超过了1.88%，“其他人员群体”和“中共党员群体”分别低0.45%、1.98%。

按文化程度是：“高等文化程度者群体”（52.18%），“中等文化程度者群体”（33.08%），“初等文化程度者群体”（25.93%），两极比差值是27.00%。比起表1比率值41.28%，“高等文化程度者群体”超过了11.10%，“中等文化程度者群体”低8.20%，“初等文化程度者群体”低16.35%。

从以上比率值大小顺序和比差值大小，可以看出不同社会群体对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以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差异特征有：（1）在职业、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三类社会群体中，差异最显著的是不同文化程度者群体，不同职业群体其次，不同政治面貌群体最次。（2）在最显著的不同文化程度者群体中，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其态度倾向积极程度成正比。（3）比较各社会群体，态度倾向积极程度较高的是“高等文化程度者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正比差值11.10%、10.00%），加上在不同政治面貌群体中只有“共青团员群体”超过表1比率值（正比差值1.88%），这实际上表明大专以上的青年学生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比较高；相反态度倾向积极程度较低的是“初等文化程度者群体”、“生产劳动者群体”（负比差值16.35%、10.4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程度不高的生产劳动者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比较低。

二、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态度倾向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正在研讨的问题，它的内容很广，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等；包括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①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态度调查,不可能将所有的内容都列在调查问卷上,我们只是根据前一时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从民主权利、组织机构、干部制度、决策机制、法制制衡、民主监督、学术舆论、政治意识8个方面,列举了16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并按态度5级量表即:急需解决、需要解决、无所谓、不太需要解决、根本不需解决作了调查测量。这16个问题是:(1)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问题;(2)保证人民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各种权利问题;(3)改变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拖拉问题;(4)实行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问题;(5)改变终身制、家长制、特权制等干部制度问题;(6)建立能上能下、考核聘任、交流回避等干部制度问题;(7)改变决策的个人专断、防止失误的问题;(8)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科学化程度问题;(9)改变以党代法,以言代法问题;(10)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制制衡体系问题;(11)改变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织建设问题;(12)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作用问题;(13)改变行政干预学术讨论问题;(14)健全新闻舆论体系,使之真正起到监督作用问题;(15)批判重人治、清官等封建政治意识问题;(16)宣传民主、科学、合理、合法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问题。

结果显示,认为这16个问题“急需解决”和“需要解决”的普遍高于“不太需要解决”和“根本不需解决”的。前者最低的也有55.18%,后者最高的只有12.14%。在认为“急需解决”和“需要解决”的答项中,有12个问题的比率值超过了80%,其主要方面有组织机构、干部制度、法制制衡、决策机制、民主权利、学术舆论,政治意识和民主监督二个方面的比率均值也超过了70%。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普遍较高。

进一步看,16个问题按比率高低排列,认为“急需解决”和“需要解决”的前7个问题是3、4、5、6、2、9、8问题,这显示了人们对组织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提高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所持态度的积极程度更高。

三、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原因的态度倾向

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积极态度倾向,直接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原因的认知态度。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归因原理,我们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后面,紧接着提出了“您对上面问题的态度是基于什么?”问题,下面设计了4种原因。选答的结果第一位归因是“只有解决才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9.04%),第二是“积弊较深、早应解决”(24.14%),第三是“解决有利于全面改革发展”(23.06%),第四是“严重影响正常政治生活必须解决”(13.76%)。从这种归因认知顺序可以认为人们之所以赞同解决上述16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是一种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目标,而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中的“积弊”,推进“改革全面发展”的认知结构。而其中“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目标是前提性反映,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中的“积弊”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任务的反映,而“有利于全面改革发展”是对整个改革发展进程需要的反映,因此体现了人们在正确归因前提下,有顺应改革发展的积极态度倾向。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87年7月1日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四、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结果的态度倾向

为了解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结果的态度倾向，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5种成功情况，让人们作两次赞同选答，统计结果是：第1次选答赞同比率较大的两项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继续、有成功的必然性”（36.37%），“全面改革的必然、一定成功”（29.44%），两项比率之和是65.81%，占总样本的三分之二以上，显示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结果有高信心的肯定性态度倾向。然而，第2次选答赞同比率较大的两项是“最敏感最复杂的改革，经过极大努力才会有成功的可能”（49.58%），“会遇到各种阻力，使改革很难成功”（30.90%），两项比率之和是80.48%，占总样本五分之四强。这又表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情况有高忧虑的否定性态度倾向。综合两方选答，可以看出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结果的双重态度倾向。当然，既使在高忧虑的选择中，“最敏感最复杂的改革、经过极大努力才会有成功的可能”的两次选答之和是（66.79%）。

五、几点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联系下阶段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以上一、二、三方面的分析，表明人们在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评价基础上，投射出有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积极态度倾向，对解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其所以需要解决的原因认识上，也呈现出高度积极态度倾向。这说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良好的现实社会心理准备，是利于下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的。

2. 不同社会群体在积极态度程度上有一定差异，如上述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以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内积极程度高低相差悬殊，积极程度高低与文化程度高低成正比关系。再如顺应改革的积极态度倾向中，不同职业者群体内积极程度高低相差悬殊，积极程度既与文化程度高低成正比关系，还与政治素质高低成正比关系，相比之下积极程度最高的是军人群体和中共党员群体，而积极程度最低的是初等文化程度群体和生产劳动者群体。了解以上社会心理的差异，对于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政策（因为制定政策需要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程度差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的不同作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教育（如针对广大生产劳动者积极程度低的特征要着重进行宣传发动，针对大专以上青年学生只在要求提高民主化程度上积极程度很高，而在顺应改革上积极程度不高的特征，做好教育转化工作等），制订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如根据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上的积极程度差异，选择突破口、分轻重缓急地制订实施计划）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3. 上述第四方面的分析，表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结果，有两项分别选答所呈现高信心肯定性和高忧虑否定性的双重态度倾向，而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种双重态度倾向具有普遍性。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不仅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重视，而且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也需要随时把握。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谭深